

明代李白集刊布述略

誉高槐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广东广州, 510006)

摘要: 明代, 李白集之刊布盛况空前, 不仅各种宋、元版本得到大量重刻, 而且明人自编的各种选集、评注本纷纷涌现, 共计达 58 种之多, 不少版本屡经补订, 影响深远, 成为李白诗在明代得以广泛传播与接受的文献基础。系统梳理其源流、刊刻、传播及兴盛原因等情况, 对构筑明代李诗接受史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明代; 李白集; 出版; 选集; 评注; 版本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0)06-0110-05

明代, 李白集的刊刻与传播盛况空前, 不仅各种宋元旧版得到大量翻刻, 而且明人新编的各种李白集、选集、评注本等纷纷涌现; 与前代相比, 量与质均有极大提高。这成为李白诗在明代得以广泛传播和接受的文献基础, 也反映出李白诗(以下简称李诗)的接受历程与明代唐诗学演进之内在联系。考察这一问题, 对构筑明代李诗接受史有重要意义。

一、明代李白全集之源流及刊布

唐五代编辑之李白集计 4 种: 魏万编于上元二年(761)之《李翰林集》二卷; 李阳冰序于宝应元年(762)的《草堂集》十卷; 范传正编李白诗文集二十卷; “出自唐五代人手编”之王溥家藏本, “集名不详”、“与上述各集来源不同”。^[1]此四本入宋后渐佚, 除范传正本外, 内容均保存于各宋版李白集中。宋、金人所编之李白集共 7 种, 其中李白全集 5 种: 乐史《李翰林集》二十卷、录诗, 另收文十卷、号《李翰林别集》, 成于咸平元年(998); 宋敏求综合此前各本, 分类编成《李太白文集》三十卷; 曾鞏对宋敏求本加以编年、考次, 于元丰三年(1080)由苏州晏知止刊刻, 世称“苏本”, 为李白集的第一个刻本, 世传刻于南宋高宗年间的“宋蜀本”即由“苏本”翻刻, 实为同一版本;^①刻于当涂之《太白集》, 世称“当涂本”, 后经陈振孙收藏, 又称陈振孙家藏本, 南宋咸淳年间戴觉民据此翻刻为《李翰林集》, 世称“咸淳本”。^②李诗注本则有 2 种: 金人王

绘《注太白诗》, 成于两宋之交, 为“第一个李诗注本, 惜不传”;^{2}南宋杨齐贤“《集注李白诗》二十五卷”, 早佚;^{[3](25)}底本“采用咸淳本”,^[4]部分存于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元人编注、刊刻之李白集计 2 种: 萧士赟删补杨齐贤本而成之《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二十五卷, “成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以蜀刊本为底本”,^[5]现存最早版本为元至大三年(1310)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本, 另有勤有堂皇庆元年(1312)与《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合刊本; 坊刻之佚名《唐翰林李太白诗集》二十六卷。与“千家注杜”的盛况相比, 李白集在宋、元可谓寂寥。

进入明代, 宋、元李白集的各版本几乎都得到翻刻、补订, 计有 27 种之多, 广泛流布。其中, 宋版李白集被大量翻刻, 衍化为明版李白集多种, 具体为: 正德十四年(1519)陆元大刻《李翰林集》十卷, 其“后有袁翼题记”,^{[6](4598)}源自乐史《李翰林别集》; 正德十年(1515)解州刊本《分类李太白诗》二十五卷, 正德十三年(1518)刊本《唐翰林李白诗类编》十二卷, 嘉靖十五年(1536)延平刊《唐翰林李白诗类编》十二卷, 明嘉靖十八年(1539)刻本《唐李白诗》十二卷, 万历四十年(1612)刘世教编《李翰林集》四十二卷、目录四卷, 源自“宋蜀本”, 与宋敏求本同源; 正德八年(1513)歙县鲍松自刻《李翰林集》三十卷, 源自“咸淳本”, 与“当涂本”亦同源。^③以上 7 种覆盖宋版李白集的 83.3%。

元人萧士赟删补杨齐贤本而成之《分类补注李太白诗集》在明代最为盛行, 屡经翻刻、重修、删补,

收稿日期: 2010-07-08; 修回日期: 2010-10-29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李白诗歌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批准号: 20100470938)

作者简介: 誉高槐(1981-), 女, 广东南海人, 文学博士,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文学。

且在朝鲜出现汉文翻刻本，各版本达 18 种之多。明代前期出现的各版本均为基于元至大刊本的覆刻本、补刻本、重刊本，保存了萧注原貌，为原本系统，计 10 种，含域外刻本 3 种，具体有：明刊覆元刊本 3 种，正统十四年(1449)覆刊元建安余氏勤有堂本二十五卷、日本蓬左文库藏本九册、静嘉堂文库藏残本九册；元刻明修本(部分内容配以明人补刻)2 种，日本室内厅书陵部藏本十三册、静嘉堂文库藏本十二册；正德元年(1506)萧敏重刊本二十五卷；正德十五年(1520)建阳书林刘宗器安正堂刊本二十五卷；朝鲜旧活字本二十五卷，“明初已盛行”^{[6](4576)}；朝鲜铜活字本十五册，“初铸于 1434 年，相当于明宣德九年”^{[6](4577)}；朝鲜木活字本十四册。明代后期，出现多种删节补注本，计 8 种：最早为嘉靖二十二年(1543)郭云鹏宝善堂校刻本诗集二十五卷、附文集五卷(以下简称郭本)，改动较大，大量删节注文，且在卷二《古风》加入明人徐祯卿的评语及未署名的新注；其后，有霏玉斋校刻本诗集二十五卷、文集五卷，年代不详，据郭本翻刻；明万历十六年复有瑞桃堂重刊霏玉斋本。嘉靖二十五年(1546)又出现玉几山人(曹道)校刻本二十五卷(以下简称玉本)，删节较少，仅涉及卷六到卷八及卷十到卷十七以外的部分，对元版的错字亦多有订正，较有版本价值，此本后有万历年间六经堂翻刻本；万历三十年(1602)许自昌校刻本刊行，即以玉本为祖本，此本复有明末书林汪复初重印本二十五卷；崇祯三年(1630)毛晋汲古阁本亦以玉本为底本，而改题《李翰林集》二十五卷。^④

此外，有天启四年(1624)顾懋光刊《李翰林集》十二卷，版本确切来源待考。另有学界疑为明人伪托之作的崇祯二年(1629)闻启祥刻严沧浪评点《李太白集》二十二卷^⑤，以杨齐贤、萧士赧《分类补注李太白诗集》为底本；虽为伪作，对研究明代李白集之刊布，仍不失其版本学意义。上述明人重刻之李白集共 27 种，其中版本来源确切可考者 26 种；宋、元旧版的翻刻率高达 96.3%。

二、明代李白选集与评注本之刊布

除了众多宋、元旧版的广泛流传外，明人也编纂、刻印了多种李白选集及李诗评注本，共计 31 种，对李诗表现出广泛关注与高度热情。

李白选集以诗为主，出现在明代中期以后，多集中在嘉靖、万历年间：邵勋《唐李杜诗集》十六卷、嘉靖二十一年(1542)万虞恺刻本，佚名《李杜律诗》四卷、嘉靖二十一年(1542)刻本，王寅《李翰林诗选》

五卷、嘉靖二十四年(1545)闵朝山刻本，顾明《李诗选》六卷、嘉靖三十七年(1558)金澜刻本；李齐芳《李翰林分类诗》八卷《赋》一卷、万历二年(1574)刻本，周履靖《青莲觞吟》二卷、万历二十五年(1597)金陵荆山书林刻本，池显方《李杜诗选》、万历刻本；李宾《李太白文抄》一卷、明末刻本，华阳道人《李青莲清言集》二卷、明末王道润刊本。以上共 9 本，其中嘉靖 4 本、万历 3 本、明末 2 本。

李诗评注本的编纂盛况则远超过李白选集，具体表现为三方面：其一，数量众多，达 22 种。其二，兴盛期长，从明初宣德至明末天启。最早者为赖进德《李杜诗解》三卷，宣德刻本。其后各版本依次为：元人郑鼐《李翰林诗范德机批选》四卷，嘉靖十七年(1538)重刻本；^⑥王维楨《李律七言颇解》一卷，嘉靖三十七年(1558)朱茹刻本；汪旦《评选李杜诗》，嘉靖刻本；胡纘宗《李诗近体》，嘉靖刻本；胡纘宗《李诗绝句》，嘉靖刻本；^⑦林兆珂《李诗钞述注》十六卷，万历二十七年(1599)安庆初刻，后复有天启衡阳刻本；何焯辑、李廷机评《新刻翰林考正京本李诗评选》四卷，万历宗文书舍刻本；汪瑗《李白五言辨律》一卷，万历四十一年(1613)刻本；明末王象春《李诗杜诗评》，卷数及刊刻情况不明；^⑧胡震亨《李诗通》二十一卷，成于崇祯十五年(1642)，刊于清顺治七年(1650)。其三，出现了数种屡经重订的版本，囊括 3 个版本系统、涵括评注本 11 种；在明代后期广为流传，影响深远：朱谏《李诗选注》十三卷、嘉靖二十四年(1545)朱守宣刻本，朱谏《李诗选注》十三卷及《辨疑》二卷、隆庆六年(1572)朱守行刊本，有 2 种版本；张含辑、杨慎批点《李诗选》十卷、嘉靖二十四年(1545)张氏家塾刻本，张含辑、杨慎批《李太白诗选》六卷、万历十年(1582)沈启南刻本，张含、杨慎选《李诗选》五卷、万历吴兴凌蒙初刻朱墨套印本，张含辑、杨慎等评《李太白诗选》五卷、天启乌程闵氏刻朱墨套印本，共 4 种版本；梅鼎祚编《李杜诗选》八卷、万历四年以前刻本，梅鼎祚辑《李诗钞》四卷、万历七年(1579)鹿裘石室刻本，梅鼎祚辑、屠隆集评《李诗选评》四卷、万历十七年(1589)刻本，梅鼎祚编、屠隆集评《合刻李杜二家钞评》八卷、明末余绍崖刻本，^⑨有 4 种版本。上述评注本在内容、卷数、甚至称名方面，前后均有变化：如朱谏本重刻后增加《辨疑》部分，张含本第二次重刻卷数即遭删节、明末坊刻本更采入中晚明人评点，^⑩梅鼎祚本则屡经书贾窜改作伪，加入屠隆集评等内容。可见李诗评注本在明代中后期广受欢迎，因而大量涌现，且不断被改订、翻刻；这一现象是晚明诗学思潮及士人阶层审美趣尚合力作用的结果。

这些为数众多的版本出自明代各阶层士人之手：

除元人郑鼐外,作者共19人,可考知者18人,其中著名学者4人,杨慎、胡震亨、梅鼎祚、王维楨;诗人5人,胡纘宗、张含、“以诗自负,才气奔轶”的王象春^{[10](653)}、“工诗,音节宏亮”^{[8]集部 79 册《十岳山人诗集·提要》}的王寅、“能诗……多刊书籍以行”^{[8]史部 85 册《梅紫先生别录·提要》}的周履靖;显宦2人,东阁大学士李廷机、刑部郎林兆珂;普通官员3人,赣州郡守朱谏、监察御史汪旦、凤翔府推官赖进德;世族2人,“状元宰相”李春芳之弟李齐芳、同安官宦世家子弟池显方;普通士人5人,顾明、李宾、汪瑗、邵勋、华阳道人。这一编刻盛况充分体现出明代士人阶层对李诗的关注热情,多出自学者诗人、显宦世族之手则进而显示出明人所编之李白集总体水平较高。

三、明代李诗评注本简评

在李白研究史上,明代之李诗评注本数量空前;然质量亦良莠不齐,需加评析。20种评注本中,除去重出之修订本,今存可考者8种。其中有足垂范后世者,有将此后之李诗研究推向新高度者,均影响深远;亦有剽窃浮泛、无足征信者,实为明代不良学风之反映。试逐一简述之:

明人注李的巅峰之作为胡震亨《李诗通》。此书不仅芟杨、萧旧注之冗繁,纠其谬误;且体例独特,注释简明扼要,偏重诗旨、诗艺之抉发,评点多精妙独到,在李诗研究史上独树一帜、垂范后世。杭世骏《〈李太白集辑注〉序》加以盛誉:“太白之集,历五百年而始有萧、杨二家,又历五百年而始有盐官胡氏孝辕。”^{[11](1683)}王琦《〈李太白集辑注〉跋》亦曰:“明季孝辕胡氏作《李诗通》二十一卷,颇有发明,及驳正旧注之纒纒,最为精确”,^{[11](1688)}其“辑注《李太白全集》时有许多地方参考了胡氏注,有的公开予以表明,有的则暗中受其启发”^{[2](65)}。其次为朱谏《李诗选注》。此书“笺释文义,大抵以杨齐贤、萧士赧《分类补注》为蓝本,而删其词意浅俗不类白作及虽系白作而出于不经意者。”^{[12](卷二六)}其注释详尽且注重串讲,体例颇为独特;与此前偏重训释词语典故的注本相比,更有助于读者把握李诗意境,不失为研究李诗之新方法,促进了李诗在明后期的普及。尤可注意者,朱氏此书“正式提出‘李诗’这一概念……为李诗学的建构做出了贡献”,且“有些注解发人所未发,给读者以启迪”。^{[2](53-54)}但其“每篇必傅以六义,则未脱宋以来讲学家说诗窠臼”^{[12](卷二六)},注释也存在一些错误。然而“在明朝的李诗全集注本中”,惟其“最为详明而又有特色,虽瑕瑜互现,还是非常可贵的”。^{[6](4653)}再次,则为梅鼎祚《李

诗钞》。此本选诗颇精,“虽无笺注、序跋、圈点各项,然有多家评语,亦足资考证”^{[6](4657)};且梅氏本为著名诗人及评论家,此本与中晚明诗学流变及唐诗学演变颇有关联,值得深入研究。此外,张含、杨慎《李诗选》选李白名作160余首,分为古风等十余类,卷首有杨慎序,对李白籍贯详加辨析,有一定学术价值;杨批以考订为主,注重李诗名物训诂及史地本事之阐释、尤“致力于从汉魏、六朝寻找李白诗歌的素材”^{[13](124)},颇有发明。张含感慨杜集已有节抄选本数十家、李集独无而作是书,对此后李诗评注本的大量涌现颇有开创之功。汪瑗《李白五言辨律》则收李白五律159首,分类辨析,以合唐律者为正律,合古律者为变律;以正统的格调派诗学观参与明代李白“古法律诗”之论争,对李白律诗在明代的经典化有一定促进作用。以上评注本或完善传统之李诗注,或开创李诗研究之新方法,均促进了明代的李诗研究。

明人注李,最次者为林兆珂《李诗钞述注》,“主要抄自杨、萧注,也有的抄自明朝人的著述,如郭云鹏本所收徐祜卿评语以及唐汝询《唐诗解》中的见解”、且“所有录自他人之说均不说明出处”^{[2](72)};加上错字很多,实为明人空疏剽窃学风之典型,因而在明后极少传世。其次则为朱谏《李诗辨疑》,将200多首李诗定为伪作,几占现存李诗的25%,且“大都别无他证,是不足凭信的”^{[6](4653)}。《李翰林诗范德机批选》嘉靖刻本之撰者郑鼐为元人,故不列入讨论。李廷机《新刻翰林考正京本李诗评选》流传不广,有清华大学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藏本,今未见。

四、明代李白集刊布盛况探源

李白集在明代的刊布盛况,既与明代文学的复古尊唐思潮及唐诗学的兴盛密切相关,同时也存在深厚的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基础,是各方面因素合力的结果。

首先,这与贯穿明代文学的复古尊唐思潮、尤其明代中后期盛行之“诗必盛唐”风潮及唐诗学的蓬勃发展息息相关。大致而言,李白集的刊布情况与明代诗学的复古思潮及唐诗学发展进程基本一致。从表1可以清楚看到明代李白集之年代分布、种类数量及传播规律:李白集的刊刻自“前七子”兴起的正德年间逐渐增多,尤以“后七子”主盟文坛之嘉靖与“公安”、“竟陵”主盟文坛之万历年间最多,至明末仍不衰;李白全集的刊刻集中在“前后七子”活动的正德、嘉靖间,李诗选及评注本的兴盛则稍晚,集中于“后七子”及“公安”、“竟陵”主盟文坛的嘉靖、万历年间;李杜合刻本则自

表1 明代李白集刊布年代、版本情况表

	明初至茶陵派兴起			“前七子”主盟 文坛	“后七子”主盟 文坛		“公安”、“竟陵” 主盟文坛	明末			年代 不明
	宣德	正统	待考		嘉靖	隆庆		万历	天启	崇祯	
李白全集	1	1	3	6	4	0	4	1	1	5	
李白选集 及评注本	1	0	0	0	11	1	10	2	1	4	1
李集总计	1	1	3	6	15	1	14	3	2	5	6
李杜合刻	1	0	0	0	2	0	6	3	2	1	3

注：“李杜合刻”指此期李白全集、选集及评注本中的李杜合刻本数目，数量不列入“李集总计”。

嘉靖后日盛，鼎盛期为万历，明末渐次减少。将上述情况与明代文学的发展及唐诗学进程对照，可见二者之内在联系：复古尊唐为明代诗学的主流，作为唐诗典范的李诗日益受重视；但明初“至永乐年间，人们更多是在师法唐人和继承风雅大道之间寻找契合点……杜诗为‘诗道’典范。”^{[13](5)}成化至正德初，茶陵派领袖李东阳仍“选择杜诗作为‘盛唐格调’的典范”，^{[13](5)}因而李白集在正德前刊刻尚不算多；正德间“前七子”勃起，其领袖李梦阳、何景明提倡“诗必盛唐”，并努力学习李诗，^①李诗声望渐高，李白集之刊刻亦自正德后日广；嘉靖间“后七子”承而推之，李白地位继续攀升、绝句被推为“唐三百年一人”，^{[14](第1382册)(92)}然其时“诗歌创作宗杜，诗论则李杜并重”，^{[15](99)}李白集与李诗评注本刊刻虽形成高潮，李杜合刻尚少；万历年，“公安”、“竟陵”起而纠“七子”之摹古、提倡“性灵”，李诗中的性情、神韵成为新的效法因素、重杜风气渐变，李白集的刊刻再次进入高潮、李诗评注本及李杜合刻本极盛；明末，性灵诗学逐渐退潮，“人们对李杜的评价似乎努力做到没有高下之分”，^{[15](100)}李白集亦不少，而其中85%为李杜合刻本。可见，李白集之兴盛与明代文学复古思潮及唐诗学进程之同步关系。

其次，这与李白的人格特质、作品风格与明代社会的文化思潮、审美风尚的内在契合有关。明代前期，因夷华鼎革，广大文士普遍表现出企羡汉唐盛世的政治理想及文化情结；在文学上则体现为对阳刚雄健、恢弘壮阔之风格、境界的审美追求。李诗向以雄奇纵逸见长，正契合这一审美追求；因而受到士人阶层的热情关注：杨萧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在明代前期屡经翻刻，李诗评注本亦开始出现，计达8种之多。明代中后期“心学”流行，带来思想、文化、文学领域的巨大变革：各阶层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个性解放思潮兴起；性灵文学蓬勃发展，唐宋派持“本色”论、李贽执“童心”说、公安派倡“性灵”、竟陵派师心“求灵”；追求独立特行、任情适意、张扬个性的风气弥漫中晚明社会。而李白傲岸狂放的人格、露才扬己的个

性、纵逸奔放的诗风恰与此期社会及文学思潮产生深层契合。李白自道“我本楚狂人”，“狂”是其人生及作品的象征，是其勇于反抗、追求精神自由之人格特质的鲜明表征。李诗夸张的表现、强烈的情感、纵逸的风格更是“狂”在文学领域的具体表现。正因着思想、文化层面的深层契合，中晚明文士对李白及其作品表现出高度的认同：嘉靖、万历年李白集得到大量刊刻、李诗评注本也纷纷涌现，达34种之多，足见时人之阅读、关注热情；其中评注本占61.8%，则知李诗研究不断深入、获得较大发展。上述因素成为李白集在明代广泛传播的重要思想、文化基础。

其三，明朝政府的大力扶持及宽松的出版政策，促成了明代印书业的极度繁盛，为李白集的大量刊刻提供了坚实的经济、物质基础。明王朝“自洪武至崇祯历十七帝……对书业基本上采取保护、扶持政策”^{[6](235)}；且“明代没有层层把关、逐级审查的图书出版制度，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出版前的审查制度。无论官府、私宅、坊肆，拟或达官显宦、读书士子、太监服役，只要财力所及，皆可刻书。”^{[6](236)}同时，明中叶后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印书业极为兴盛，“嘉靖、万历至崇祯则为隆盛期，其中又以嘉靖、万历为极盛”^{[6](237)}。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李白集在嘉靖、万历年间的刊刻高潮，而嘉靖自崇祯也恰为李白集刊布之隆盛期。

综上所述，李白集在明代进入刊刻与传播的极盛期，数目庞大、种类丰富、版本众多且不乏精品；完善了李白集的版本系统，将李诗之注释、评点等传统研究推向新的高度；为李诗在明代进入接受高潮奠定了文献基础，为明代李诗接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① 詹锳《〈李白集〉版本源流考》考订：“蜀本盖传苏本……二者是一套书版印出来的”。见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4542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

② 据郁贤皓《咸淳本〈李翰林集〉源流概述》考证：“咸淳本《李翰

- 林集》当是依当涂本《太白集》翻刻的。”其《〈李翰林集三十卷〉提要》同时指出：“咸淳本是根据陈振孙家所藏本翻刻的……陈振孙家所藏本极有可能就是周必大说的当涂本。”见郁贤皓《李白与唐代文史考论》第 618、612 页，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8。
- ③ 以上李白集各宋、明版本之源流承传参考詹锳《〈李白集〉版本源流考》及附表。
- ④ 上述《分类补注李太白诗集》版本年代及系统、源流情况参考芳村弘道《关于元版系统的〈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及詹锳《〈李白集〉版本源流考》。以上各李白集未注名称者，题名均为“分类补注李太白诗”。
- ⑤ 陈良运《读严羽〈评点李太白诗集〉献疑》、詹锳《〈李白集〉版本源流考》均以此书为伪作。分别见《古籍研究》2003 年第 1 期，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 4622 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
- ⑥ 据詹锳《〈李白集〉版本源流考》：郑鼐为范德机门人，“此书台湾中央图书馆有元刻本”，另有傅增湘藏明刊本，“是两个本子”。见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 4642 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
- ⑦ 胡纘宗《李诗近体跋》：“李诗近体，虽仅百首，而其天才俊丽，不可矩矱……因摘出刻之……同刻者又有……李诗绝句云。”胡纘宗自嘉靖十三年罢官后开阁著书，卒于嘉靖三十五年，可推知此二本为嘉靖刻本。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62 册《乌鼠山人小集》卷十四，济南：齐鲁书社，1996。
- ⑧ 据李若讷《王季木李诗杜诗序》：“友人季木(王象春)枕籍二家，为之签品……其于李也，择其隽伟隽语矣，且订其真本及误字……于李多及其古体……其指斥二家之疵，类大抵李往往有浮冗。”未载卷数及刊刻情况。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10 册《四品稿》卷五，济南：齐鲁书社，1996。
- ⑨ 陈晨《〈唐二家诗钞〉版本考述》考证：“梅鼎祚辑撰的李杜诗选有两种——《李杜诗选》与《唐二家诗钞》……称名不同的十二卷流传本(《唐二家诗钞》及《唐二家诗钞评林》)，应是万历四年前八卷本《李杜诗选》的扩充本和改动本”；《唐二家诗钞评林》“与屠隆无涉”，“是《唐二家诗钞》经改动、删节后改换题署的坊刻本……至于‘余绍崖刻本’二种……也是从《唐二家诗钞》发展而来的。”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 年第 3 期。
- ⑩ 《李杜诗选·提要》“乌程闵氏所刊朱墨板，其卷端评语引及钟

惺、梅鼎祚皆明末人，含及慎在嘉靖中，何自见之，则已非含之原本矣。”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299 册《李杜诗选》，济南：齐鲁书社，1996。

- ⑪ 李梦阳作有《效李白体》六十四首，何景明《〈海叟集〉序》言己：“学歌行近体诚有取于(李、杜)二家”，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67 册《何大复先生集》卷三十四，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参考文献：

- [1] 郁贤皓. 宋蜀本《李太白文集》提要[A]. 李白与唐代文史考论[C].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8.
- [2] 胡振龙. 李白诗古注本研究[D].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3.
- [3] 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
- [4] 郁贤皓. 《李翰林集三十卷》提要[A]. 李白与唐代文史考论[C].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8.
- [5] 郁贤皓. 咸淳本《李翰林集》源流概述[A]. 李白与唐代文史考论[C].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8.
- [6] 芳村弘道. 关于元版系统的《分类补注李太白诗》[A]. 中国李白研究(1992-1993 年集)[C].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 [7] 陈良运. 读严羽《评点李太白诗集》献疑[J]. 古籍研究，2003，(1)：.
- [8]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M]. 济南：齐鲁书社，1996.
- [9] 陈晨. 《唐二家诗钞》版本考述[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3)：.
- [10] 钱谦益. 列朝诗集小传[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11] 王琦. 李太白全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2] 孙诒让. 温州经籍志[M]. 浙江省立图书馆藏刊本.
- [13] 孙春青. 明代唐诗学[D]. 天津：南开大学，2005.
- [14] 文渊阁四库全书[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15] 朱易安. 明人李杜比较浅说[A]. 李白学刊(第一辑)[C].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
- [16] 周心慧. 明代版刻述略[A]. 中国古代版刻画史论集[C]. 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

The Publishing and Spreading of Li Bai's poems: Ming Dynasty

YU Gao-huai

(Liberal Arts College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In Ming Dynasty, Li Bai's poems were inscribed, spreading on a large scale, the condition was unprecedented, not only all kinds of editions in Song Dynasty and Yuan Dynasty were reprinted, but also all kinds of selections and editions with comments uninterruptedly appeared, totaling fifty-one kinds. Many editions were supplemented many times, having a deep and far influence, becoming a base of historical data on which Li Bai's Poems were widely spread and accepted in Ming Dynast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origin and development, printing and spreading of Li Bai's poems.

Key Words: Li Bai's poems; Ming Dynasty; Publication; selected poems of Li Bai; reviews; edition

[编辑：胡兴华]